第一章

东北各族民众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艰苦斗争

第一节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地区

一、日本制定新的侵华政策

明治维新后,日本帝国主义即推行所谓“大陆政策”,蓄谋侵略我国。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在中国取得许多特权,并占有了“南满铁路”。1906 年日本又在旅大地区设立“关东州都督府”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作为侵略活动的总指挥部。从此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更加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疯狂的侵略活动。

1927 年 4 月，以“中国征服派”闻名的田中义一和森恪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乘日本经济危机之际，推翻了他们认为对华“软弱”的若槻内阁,于同年 4月 20 日组成了以田中为首相(兼外相）、以森恪为外务次官的田中内阁（田中在辛亥革命时，就力主征服中国。森恪是经营中国煤炭等企业的三井系统的资本家，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关东军关系密切，在日本国内以“对华强硬派”知名）。田中内阁一上台就疯狂推行侵华政策，急谋吞并东北三省。1927 年 6 月 17 日至 7 月 7 日，田中于东京召开了策划侵华特别是侵略东北的具有重大作用的“东方会议”。“东方会议”的骨干成员除田中、森恪外，还有日本亚洲局长木村、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关东军司令官以及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和“满铁”等的许多重要官员。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所谓“满蒙”问题。其核心是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

会议结束后，田中义一将会议讨论决定的方针政策，拟成一个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于同年 7 月奏呈天皇。奏折赤裸裸地说：“惟欲征服支那（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此次会议是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的新发展。

“东方会议’后,田中内阁立即指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进行所谓“满蒙交涉”。在“交涉”中，日本侵略者提出：(1) 要在东北由日本贷款包建七条铁路，首先要建立吉会路（由吉林至朝鲜的会宁）和长（长春）大（大赉，今大安市）路，以便日本由朝鲜直达吉、黑腹地；（2）要扩大铁路沿线的商埠地区,并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商租权’‘营业权”,使日本人可以自由地在东北租借土地、房屋；(3）延长本溪湖矿山的合同期；(4）抗议东北当局修筑与“满铁”平行的铁路线。此外，还要求与东北当局签订“治安协定”和在临江设立日本领事分馆等种种侵略要求，叫嚷要解决“满蒙悬案”，特别强调“在满洲实行强硬手段”。为了寻找借口，1931 年 7 月，日本在吉林省长春市北郊的万宝山，制造了屠杀中国农民和挑拨中朝关系的万宝山事件。8 月又利用日本参谋本部军官中村和随员三人非法潜入大兴安岭地区进行间谍活动，被中国驻军抓获处死的所谓“中村事件”，煽

动战争狂热。

二、九·一八事变与东北地区的沦陷

日本帝国主义经过多方密谋策划、充分准备之后，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是夜，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所属第3中队——柳条湖分遣队的几名士兵，在河本末守工兵中尉带领下，按预定计划，到达沈阳北郊距中国驻军北大营不远的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段，于10时20分将路轨炸毁，并立即向北大营射击。埋伏在附近的第3中队便照计划规定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报告了奉天特务机关和守备队第2大队本部，反诬北大营的中国兵炸毁铁路，随即向北大营中国驻军进攻。守候在特务机关的板垣征四郎得到报告后，便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名义，命令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进攻北大营，第2师团第29联队进攻沈阳城。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接到板垣的急电后，立即发布命令，令第2师团等部队迅速攻占沈阳，令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的日本驻军立即攻占沿线的安东（今丹东市）、本溪、营口、长春等地。同时，电请驻朝鲜日军越境增援。

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官兵在日本侵略军冲入营内时，虽曾被迫自卫还击，但是接到东北边防军代理司令、参谋长荣臻转达当局“全取不抵抗主义”的命令，只好忍痛于19日晨冲出日军包围，撤退至东山咀子东大营待命。北大营遂被日军全部占领。

与此同时，关东军步兵第29联队也迅速攻进沈阳，占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宪兵司令部、警察署等重要军政机关和电报局、电话局及各大银行等通讯设施和金融机关。一夜之间，沈阳全城便沦入敌手。

9月18日夜至19日，日本侵略军在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

全面出击，先后占领了海城、营口、辽阳、鞍山、铁岭、四平、公主岭、长春和安东、本溪、抚顺等城镇。

日军占领沈阳、长春后，即将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移驻沈阳，第 2 师团集结长春。同时，驻朝鲜的日军越境，侵入东北，填补了第 2 师团北移后的防务。

沈阳失陷后，代理吉林省政府主席、吉林边防署参谋长熙洽，下令吉林驻军全部撤出吉林城。9月 21 日，在日军第 2 师团沿吉长铁路进攻吉林时，熙洽派人与日军谈判无条件投降。当天午后，日军占领吉林。23 日，日军又沿吉敦铁路东进，相继侵占蛟河、敦化。

9 月 23 日至 25 日，日军又进而侵占郑家屯、通辽、洮南与新民等地。

至此，时仅一周间，日军攻占城镇和战略要地 30 处，辽吉两省的大部分地方化为敌有。

当时，日本发动进攻的侵略军，包括关东军和一部分驻朝鲜日军共约 2 万余人，而东北三省的东北军除调到华北 10 余万人外，尚有 15 万以上的兵力。日军以独立守备队第 2 大队共 500 人即攻下了东北军第 7 旅 7000 余人驻守的北大营，又用一个联队的兵力攻占了偌大的沈阳。东北军几倍于敌，却不战自退，这完全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结果。

蒋介石南京政府此时正调集 30 万兵力在南方“围剿”工农红军，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行径却不出一兵一卒，仍然采取退让政策。日本侵略者从 1927 年田中内阁上台便认为国民党政府软弱可欺。1928 年出兵济南的事件，以及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中，蒋介石都一再电令张学良“隐忍自重”，“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因此，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毫无作战准备，东北军和东北各省的军政首脑

几乎都远离职守。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指令东北当局：“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东北当局完全遵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东北军不战自退，驻在辽宁的部队 5 万余人辗转退至锦州、辽西。

时值国际联盟召开大会，国民党南京政府幻想国联“主持公道”。操纵国联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图谋将战火引向苏联，因而袒护日本。国联虽然多次开会，先后作出三次决议，却向中日两国提出双方撤兵，避免事态扩大的“紧急警告”，竟然露骨地纵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

三、日本炮制“满洲国”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侵占沈阳、长春、吉林等城市，关东军总部又迫不及待地于 9 月 22 日抛出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决定扶植清朝废帝溥仪，收罗汉奸，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借以使东北与中国脱离，使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合法化。经关东军策动，一些汉、满民族败类如熙洽等便摇旗呐喊，开始进行所谓“独立”与“自治”运动。

首先宣布“独立”的是吉林省的熙洽，经日本关东军的策划，9 月 26 日，成立吉林省长官公署，由熙洽任长官，宣布与南京政府和张学良东北地方政权脱离关系而“独立”，但实权却掌握在由日本人组成的顾问团手中。

日本侵占沈阳后，9 月 20 日，便任命其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为沈阳市市长；不久，为欺骗世人，又推出由日本豢养多年的汉奸赵欣伯充当奉天市（由沈阳市改）市长。同时成立“奉天自治维持会”，以袁金铠为委员长，代行省政府职能，宣布与张学良和南京政府断绝关系，并将辽宁省改称奉天省。 12 月 15 日，“维持会”解散，16 日由前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任省长，日本人充当顾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由于日军尚未占据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省特别区，该特区长官张景惠在关东军板垣的策动下，于 9 月 27 日宣布组织“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未立即公开其汉奸的面目。在 11 月 19 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马占山抗日暂遭挫折之后，张景惠即于 1932 年初发表“独立宣言”，并赴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主席。但是却又委吉祥代理省长，同样以日本人组成顾问部，掌握黑龙江省实权。

此外，在关东军的策动下，吉林洮南镇守使张海鹏、辽东边道镇守使于藏山等，分别于 1931 年 11 月先后投敌，自任保安司令。

接着，日本侵略者积极筹划建立全东北的傀儡政府。关东军按既定计划，于 11 月初特派土肥原至天津劝诱溥仪出任“元首”。土肥原一手制造了天津日租界汉奸便衣队向华界挑衅事件，同时便以保护溥仪“安全”为名，乘机将其挟持到了东北。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在国联李顿调查团来东北之前建立起傀儡政权，经过日本政府、关东军的紧张策划，终于在 1932 年 2 月 16 日，由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各省汉奸在沈阳召开了“建国会议”，遂即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东北“独立”宣言。是年 3 月 1 日，宣布成立“满洲国”，年号“大同”，“首都”设在长春，改称“新京”。3 月 9 日，溥仪出任满洲国“执政”。第二天，溥仪公布了关东军早已炮制好的政府成员名单，由郑孝胥充任“国务总理”，臧式毅任“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熙洽任“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张景惠任“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别区长官”等。

同日，溥仪以致关东军司令官函的形式，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项卖国密约。该密约规定：“满洲国”的国防、治安均委日本负责，所需经费由“满洲国”负担；日军所需之铁路、港湾、水路、航空及新路的布设，均委日本管理；日军所需之各种设施，皆

由“满洲国”援助；“满洲国”各级政府官员日本人均可充任，日人官员之任免皆需经关东军司令官保荐或同意。9 月 15 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满洲国”。同一天，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大使武藤信义与“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署了《日满议定书》。该议定书承认过去日本所获得的一切权益；确认日军长期驻扎于“满洲”。因此，“满洲国”名为“独立国”，实质上一切大政方针，都由日本关东军制定，再由日本人逐级执行，日本人直言不讳地宣称：“在满洲国的政治上次长会议占重要地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 1932 年更明确指出：“关于新政府的一切政令，自可按步进行，惟需经过驻地之日本军部及特务机关许可方能实行”，① 充分表明了这个由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炮制的傀儡政权的殖民地性质。

第二节　东北各地各族民众武装抗击日本侵略

一、东三省各族军民的武装抗日

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兴起，曾发展到 30 余万兵力。包括十来个旅的东北军正规部队和各地群众性自发的武装队伍，遍及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各个角落，给了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这种军民团结抗击侵略的斗争，是中国近代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上所罕见的。

原吉林省驻军八个旅和一个卫队团中，自熙洽投日组建伪省

①转引自李新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卷 2，第 156 页。

政府后，仅有三个旅和三个团投敌，其余都参加了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斗争。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长冯占海，斥责熙洽的叛国行径，拒绝其收买利诱，9月末在驻地永吉县官马山誓师抗日，开进舒兰、五常一带，沿途许多爱国的满族青年投入该部，还接纳了愿意抗日的绿林宫长海、姚秉乾等部，部队迅速壮大达万余人。冯占海接受原吉林省政府主席的任命，任吉林省警备司令，所部改称吉林警备军，下辖四个旅，二个支队。

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沦陷后，驻守哈尔滨的滨江镇守使、中东路护路军司令、28旅旅长丁超，联络依兰镇守使、24旅旅长李杜和冯占海部共同保卫哈尔滨。1932年1月下旬，李、冯二部开抵哈埠，并取得了哈尔滨保卫战的初胜，各族军民异常兴奋。各族各部联合组成吉林自卫军，公推李杜、冯占海任总、副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司令，冯占海、邢占青、赵毅分任左、中、右三路总指挥。

吉林东部的另一支著名的抗日部队，是以吉林步兵第27旅676团第3营王德林部为基础而成立的。九·一八事变后,延吉镇守使27旅旅长吉兴投靠熙洽降日，王德林官兵不满，曾击毙闯入禁区测量吉会路的两名日军。1932年1月王德林带领全营官兵在延吉小城子宣布起义抗日。附近满、朝、汉等族群众欢欣鼓舞，纷纷来投，并受到军警各界和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中共东满党组织为争取王德林部队，也派遣了旧日与王德林有关系的李延禄等到该部活动。1932年2月8日,王德林召开誓师大会,宣布部队改称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由王德林任总指挥，孔宪荣为副指挥，吴义成为前方司令，不久又委任李延禄为参谋长。这是一支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的抗日武装。

吉林救国军成立后，立即开始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行动。2月25日进攻敦化。敦化是日本侵略者急于修通的吉会路的

重要据点，是由吉林到宁安、密山的战略要道。救国军攻下敦化，打死日军 50 余人。该部又乘胜相继攻下蛟河、额穆，移兵镜泊湖畔。在这里，救国军一部在李延禄的指挥下与日军上田支队周旋，展开镜泊湖连环战斗，其中仅墙缝伏击战就歼日军官兵 100 余名，湖西伏击又歼日军 100 余名。日军上田支队在付出惨重代价后，撤向宁安县城，但宁安城外已被救国军团团围住。不久，日军被迫经中东路撤往哈尔滨，宁安遂为救国军收复。一时间，远近满、朝、汉各族投军者日众，救国军迅速增至 1.5 万余人，部队扩编为五个旅，由王德林、孔宪荣、吴义成、刘万奎、郑兴等分别担任旅长。李延禄仍为参谋长兼补充团团长。同年 8 月，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周保中到救国军总部，任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团结教育救国军官兵坚持抗战。吉林救国军先后活跃在中东路东段沿线和东宁、穆棱、宁安、汪清、珲春、敦化、安图、额穆等地，曾攻克敦化、安图、额穆、东京城等，破坏吉会路工程，多次击败日伪军的进攻。

辽西一带的抗日义勇军组成得比较早。主要有二十一路，八个支队。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绿林帮伙组成的抗日武装——东北国民救国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纵队（后改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第 12 路），以及第 4 路、第 48 路等等，活动在黑山、新民、彰武、北镇、兴城、绥中一带，袭击日军的铁路运输，出其不意地打击日伪军。新民县一战，日本骑兵第 27 联队长古贺率所部 80 余人，当场有 40 人丧命，重伤 20余人。日本侵略者惊呼“这实在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①

辽南最早的几支义勇军，是 1931 年 10 月底协助辽宁公安骑兵总队镇压汉奸凌印青部队时，由东北军爱国将领黄显声组编的

①《协和》杂志，昭和 7 年（1932）第 2期。

项青山、张海天、盖中华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二、三路，他们分驻盘山、辽中、台安各地。不久，曾任东北军军官的李纯华联络项青山等辽南一带义勇军组成辽南救国军，活动在辽（阳）、海、盖、复、营、台、辽（中）等地，曾与邓铁梅等抗日部队多次联合打击敌军，攻占盘山、辽中、台安，袭扰营口、辽阳，破坏南满铁路，阻断交通，对辽南的抗战作出了贡献。

1932 年 8月 24 路与 21路义勇军在李烈生(李兆麟)、林郁青的参与领导下，进攻沈阳城，火烧飞机库、汽油库，攻击兵工厂，令日本侵略军大为震惊。

活动在辽南凤城、岫岩、安东三角地带的邓铁梅部队，是一支以农民为基础的群众性抗日武装。邓铁梅是一失业警官，九·一八事变后到凤城小汤沟组成东北民众自卫军，自任司令。同年 12月 26 日攻入凤城,毙伤日军 50 余名。此后，队伍发展很快。

在辽南三角地区活动的苗可秀部,原属邓铁梅民众自卫军,后来创立少年铁血军，坚持在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不断重创敌军。

辽东于 1932 年 3月，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4月 21 日誓师抗日，唐聚伍任司令。该军共有 19路，先后夺回新宾，攻占柳河，释放大批抗日群众，乘胜收复金川与辉南县城，影响广达数十县，使辽东地区敌军陷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辽、吉两省大部地区之后，为实现其侵吞满蒙的野心，便积极策划向北满进军，继续侵占黑龙江省。为统一军政指挥,张学良于 10月 10 日任命当时驻守黑河的警备司令、第 3旅旅长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

马占山抵齐齐哈尔,发表宣言,决意抵抗,加强江桥防务。于是著名的江桥抗战爆发，历时 16 天。

11月 4 日，日军从早至晚接连几次进攻江桥，均被黑龙江守军击退。第二天，日伪军调集了 8000余兵力、百余门大炮，发起

强攻，但又为誓死抵抗的守军击退。日军死 167 人，伤近 1000 余人；伪军死伤 700 余人。6 日，日军从凌晨起又大举进攻。守卫江桥的广大官兵，奋勇杀敌，激战一天，敌军遭受重大打击。日军滨本步兵联队几乎被全歼，高波骑兵队死伤殆尽。黑龙江守军也伤亡 600 余人。守军因连日苦战，十分疲惫，工事尽被摧毁，为保存实力，以利再战，乘夜撤离江桥阵地，至三间房一线扼守新的阵地。

11 月 12 日，日军天野、长谷、铃本等旅团和满铁守备队共 7000 余众，分兵三路，开始新的进攻。马占山亲自指挥守军浴血奋战，连日挫退敌军，阵地失而复得。虽然黑龙江守军伤亡很大，但士气高昂。日军增派两个混成旅团驰援，17 日援兵开到，遂即发起总攻。黑龙江守军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在 18 日放弃三间房阵地向齐齐哈尔退却，19 日再退克山。

江桥抗战，是东北各族爱国官兵置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于不顾，自动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举。此战，大大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猖狂一时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特别是东北各族人民的爱国意志，推动了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揭开了东北军民长期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斗争的序幕。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指出："满洲的形势是极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开展"，"在开始发动游击战争的时候，要找出群众斗争比较活跃、统治阶级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游击队作群众武装斗争的前锋，群众作游击队的基础，游击队与群众配合起来才能开展游击区域与加强扩大游击队。"①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东北各地创建了南满磐石、海龙工农义勇军；东满延吉、汪清、珲春、和龙反日游击队；吉东地区救国游击军、宁安工农义务队和饶河农工

①常城、李鸿文、朱建华：《关于满洲士兵工作指示》，《现代东北史》第 190 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6 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义勇军；改编北满巴彦游击队和汤原游击队等等十来支红军抗日游击队，开辟了若干抗日游击区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二、满族人民的英勇斗争

在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地区的漫长而黑暗的岁月里，东北各族人民喘息于殖民地的深渊之中。在此居住的一二百万满族人民遭受了骇人听闻的极其野蛮的屠杀、犬食、肢解和活埋等酷刑。1932年9月15日，辽宁民众救国自卫军第11路袭击日本经营的抚顺煤矿，杀死杨伯堡矿长日本人渡边宽一。翌日下午，日本守备队开到平顶山，包围了村庄，武装逼迫全村男女老幼至村西南洼地，用机枪扫射，集体屠杀，然后将全村700余间房屋一律焚毁。这次暴行，被害的中国人达3000多人。同时，日军还将抚顺附近的千斤堡子毁灭，占这个堡子居民总数80%的满族人民全部遇难。①

日本帝国主义还大肆抓劳工，修建军事工程，以维持其残暴的殖民统治。仅在满族聚居的凤城县白旗村，273户共出劳工200余人，占总劳动力的60%左右。另外在辽宁省新宾县外和睦村这个不足50户人家的偏僻山沟，就有50多名满、汉各族青年被强迫进行无偿劳役。他们在监工的皮鞭下，每天劳动十五六个小时，生病得不到治疗，甚至不给饭吃，不少人病饿而死。例如：辽宁凤城县黄旗一屯当劳工的170人中就有50人丧生。② 为了防止劳工逃跑，日寇还在工地周围圈上铁丝网，昼夜派兵站岗。至于修筑秘密军事工程的劳工，在完工之后即被集体屠杀，更无一生还者。

①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辽宁省编辑委员会编：《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第58册第10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第58册，第110页。

日寇的暴行，激起了各族民众的反抗怒潮。凤城县原县公安局长邓铁梅、东北大学学生苗可秀、东北军军官李春润、满族爱国青年阎生堂等，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收复东北”号召的鼓舞下，先后组织抗日队伍，利用凤城、岫岩、安东三角地区山高林密的优势，同日伪军队进行浴血奋战。

1931年冬,邓铁梅在凤、岫边界建起东北抗日民众自卫军,仅两个月时间就达2000余人。满族群众积极参加自卫军，在骑兵第5旅旅部40人中就有30人是满族。他们以凤城、岫岩一带满族聚居的地区为根据地，到处袭击日军。1931年12月26日深夜,邓铁梅率兵攻打凤凰城，给日伪军以突然袭击，消灭日伪军30多人，缴获步枪300余支、轻机枪两挺、迫击炮两门、各种手枪和弹药不计其数。刚刚拼凑起来的伪警察队被打得落花流水。自卫军还砸开日伪监狱，解救出大批抗日爱国同胞。自此，自卫军名声大振，震慑敌胆，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吸引了更多的民众参加抗日。

1932年夏,国民党东北军军官石培基(又名方雨),受驻北平的东北救国会委托，到家乡凤城观察抗日形势，建议邓铁梅组织军官教导队，由邓铁梅任队长，苗可秀任教育长；在部队内部实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军事素质有了显著提高，大大增强了战斗力。一次，凤城的伪警察骑兵队50多人，夜宿卡巴岭三义庙。民众自卫军获得这一情报后，立即派出50余名自卫军带领一部分群众，于深夜包围了三义庙。战斗打响后，随军群众在山上点燃鞭炮，鞭炮声和自卫军的枪声连成一片。敌人惊慌失措，加之抗日军高声喊话，交待抗日政策，庙里的敌骑兵只得交出全部枪支弹药，当了俘虏。这次战斗，共缴获步枪50多支、战马50多匹，进一步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到1932年秋，抗日民众自卫军已发展到1.5万余人，组成八个团，两个大刀队，其中半数以上是满族青年。

1933 年,李春润率抗日部队多次奋战,以新宾县为根据地,一度收复了本溪、抚顺、清原三县大部分地区；后转战到凤城，积极联合邓铁梅、刘景文等部，在三角地带坚持抗日斗争，并派人到新宾、桓仁、宽甸、通化等地联络义军。7 月间，他从北平秘密运回数帆船武器弹药，并亲自带兵运回凤城防地。在收复红旗街的激战中，他率领主力部队千余人进攻红旗街，击毙日伪军数十名，缴获步枪一百余支，收复了红旗街。

1934 年 2 月，苗可秀在岫岩县三道虎岭，以军官教导队部分队员为骨干，建立了抗日少年铁血军，并提出：“爱护老百姓，联合警备军（伪军），团结义勇军，打倒日本军”① 的战略方针。在日军发动的几次大讨伐中，铁血军一直是阻击日伪军的中坚力量。苗可秀壮烈殉国后，满族青年阎生堂继任铁血军一大队队长。他领导的铁血军被群众称为“阎团”。阎团纪律严明，武器充足，活动时间长。他们先后在汤河村、大堡、沙里寨、龙王庙等地，多次与日伪军激战，屡建奇功，战果辉煌。

在勃利地区，满族中共党员富振声，为建立抗日军队千方百计地搞武器。他一方面组织动员人打柴草卖钱买枪，一方面夺取敌伪“自卫团”的枪械武装自己，终于在 1934 年春建立起一支游击队，它就是东北抗联第 4 军 2 团的前身。1934 年，中共依兰县地方党组织（负责人都是满族），动员当地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族农民参加游击队，其中还有满族妇女，她们和男同胞一样冲锋陷阵，奋勇杀敌。

东北抗日联军第 3 军、第 4 军、第 5 军、第 6 军、第 7 军、第 8 军、第 9 军、第 11 军转战在满族聚居的松花江中、下游与牡丹江一带。在这些区域内，居住着百万以上的满族人民，他们和其

①《凤城满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凤城满族自治县概况》第 61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 年。

他兄弟民族一样，全力支持东北抗日联军。各地的满族人民踊跃入伍，仅佳木斯以西的满族聚居区，一次就有七八十人参军，在其他地方参军的亦不少。在每个军里都有满族指战员。据调查，师长以上的满族领导干部有王光宇、张兰生（鲍巨魁）、陈翰章、关化新、伊俊山等人。他们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战斗中，经受了考验和锻炼，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骨干。他们的抗日救国英雄业绩，永远铭刻在各族人民心中。

三、朝鲜族农民“秋收”、“春荒”斗争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族人民，奋起参加抗日斗争。延边的朝鲜族人民组织了“反日会”和“反帝同盟”、“农民协会”等抗日团体，出版《反帝战线》，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决斗争。中共东满特委根据抗日斗争日益高涨的形势，因势利导，发动了 1931 年的“秋收”斗争和 1932 年的“春荒”斗争。

秋收斗争，是由于反动地主拒绝实行 1931 年 3 月地方政府发布的“四六”、“三七”减租法令，并因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企图镇压群众而激起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1931 年秋，中共东满特委向各族农民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地主，实行三七、四六减租”等口号，号召农民投入秋收斗争。

1931 年 9 月,延吉县老头沟附近的官道口、大箕洞等地的 800 余农民首先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打响了秋收斗争的第一炮。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包围地主庄园，打开粮仓，把囤粮分给佃农。 11 月，八道沟附近的几百农民在中共八道沟区委的领导下，包围地主庄园，要求实行减租法令。八道沟日本警察分署出动警察强行解散群众。愤怒的农民冲破警察的包围，向局子街（今延吉市）进发。当时延吉县各地农民代表也参加了这个队伍，并要求与延吉

县知事谈判。在舆论的压力下，延吉县署被迫答应农民要求，实行减租法令。局子街附近的 2000 余农民也聚集在小营子召开誓师大会，包围地主庄园，强迫地主打开谷垛，按减租法令分给佃农；同时举行示威游行，冲到局子街包围伪公安局，抗议警察镇压秋收斗争的暴行，救回被捕群众。聚集在局子街的延吉县各地农民代表也分成南北两路，分别往朝阳川、太阳方向前进，沿途在当地农民配合下冲入地主庄园，把粮谷分给农民。 1931 年秋，在和龙县农民协会会长具成泰的领导下，和龙县开山屯附近的子洞、三东浦、泉坪、厚洞等地 300 多农民集中到光昭开会，向地主宣读减租减息法令，并令其打开谷垛分给佃农。农民队伍往石建坪前进，沿途群众增至几千人。日本帝国主义出动警察镇压，并调日本驻朝鲜守备队西渡图们江堵截。愤怒的群众与日军展开搏斗。汪清县百草沟、大汪清、小汪清，珲春县密江、敬信等地的农民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减租废债斗争，并逮捕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召开公审大会予以处决。延边各地农民的秋收斗争虽然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阻挠与破坏，仍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促进了抗日斗争的发展。

1932 年春，延边朝鲜族农民和各族农民一起又掀起了“春荒”斗争。在中共东满特委提出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没收他们的一切财粮分给贫苦农民”、“向地主借粮度荒”的号召下，1932 年初，延吉县依兰沟几百名农民首先掀起借粮夺粮斗争。2 月初，南阳村、柳菜、王隅沟等几百名农民结队清算日本走狗，没收其财粮分给贫苦农民。为救回在斗争中被捕群众，又分头向九龙评日本警察分署进发。日本帝国主义出动日警和伪保安团，开枪打死打伤农民群众。愤怒的群众与日伪军警展开了搏斗。依兰沟的春荒斗争似燎原烈火之势，迅速燃遍东满各地。3 月，中共老头沟区委为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组织老头沟附近 300 多

名妇女到细麟河，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向地主借粮度荒”等口号，进行示威游行。同时组织群众武装——赤卫队，发动200多名农民到大箕洞清算日本走狗，把没收的财物和粮食分给贫苦农民，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春荒斗争的发展。和龙县的大砬子、开山屯、月晴、平岗，珲春县的大荒沟、烟筒砬子，汪清县的永昌洞、大坎子、转角楼等地数千农民也先后展开了激烈的夺粮、清算日本走狗的斗争。

延边的“秋收”与“春荒”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反动地主的嚣张气焰。日伪基层政权基本瘫痪，许多土豪劣绅、亲日地主纷纷逃窜到城镇。延吉县海兰区、依兰区、八道沟区，和龙县开山屯区、大砬子区、平岗区和三道沟区，汪清县蛤蟆塘、大汪清、小汪清、腰营沟、嘎呀河、永昌洞，珲春县大荒沟和烟筒砬子等地已经通过“秋收”和“春荒”斗争，发动群众清算日本走狗，夺取武器，组织了十余支游击队、别动队或突击队，将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以李红光等七名朝鲜青年组成的“打狗队”(也称赤卫队),不断发展壮大。李红光，又名李弘海，朝鲜人。1906年出生于朝鲜京畿道龙任郡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全家寄居吉林省伊通县流沙嘴子屯。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反帝斗争；历任中共双阳、伊通特支组织委员，磐石中心县委委员。九·一八事变后，李红光和孟洁民等组织起专门惩治亲日汉奸走狗的“打狗队”,李自任队长。1932年春，与孟洁民等组织发动了著名的蛤蟆河子农民大暴动。5月7日，磐石县蛤蟆河子八九百名朝、汉族农民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示威4天，破坏吉海（吉林到海龙）铁路老岭一段，惩处了50余名日本走狗，分财分粮给贫苦农民，影响波及双阳、伊通等地。同年夏初，李红光以“打狗队”为基础，建立起“磐石反日工农义勇军”。冬季，在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